

《管子》孝论:中国孝文化的理论起源

周怀宇

摘要:《管子》中关于“孝”的阐述,内容十分丰富,富有理论色彩。中国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在《管子》中上升为孝的理论。《管子》孝论主要有三大系统,包含“血缘”“师承”“君臣”等组成部分。三大系统是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体系,含有许多精辟的理论术语。《管子》孝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的“仁政”“四维”“宗法”等精深博大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管子》孝论问世,成为引导中国孝文化持续发展的引擎,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孝文化的社会实践,并在孝文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演进。

关键词:《管子》;孝;孝悌;仁;血缘;宗法;伦理

中图分类号: B2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3)01-008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49)

作者简介: 周怀宇,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徽 合肥 230039)。

孝文化缘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而演进。中国历史上的舜帝,即以孝道著称,获得社会拥戴。舜帝执政以后,提出“五教”布于四方,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记·五帝本纪》)这标志着孝文化的社会意识诞生。此后,孝文化意识、思想、理论、纲纪、实践等形成了意识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流淌了几千年。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理论,成为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文化元素。而孝文化的理论形成,始于《管子》(《管子》中关于“孝”的理论,下文简称为“孝论”)。

《管子》关于“孝”的命题有很多阐述,学术界已有一些泛论,但尚缺少理论层面的总结。由于《管子》孝论和《管子》中其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理论阐述糅合在一起,需要剥离和梳理,方可看出其丰富内容及体系。本文从研读《管子》^①入手,阐述三部分内容:梳理《管子》孝论的框架,以观概貌;分析其理论特色和

价值;探讨其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是社会思想和学术条件。

一、《管子》孝论结构:三大系统

《管子》孝论最基本的内容,是从伦理切入,针对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人伦关系,引入“孝”的概念,提出“孝”的道德观念,建立孝的学说,来规范人类社会伦理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管子》的孝论集中在《五辅》和《弟子职》两篇,其他各篇随处可见。总体脉络,可归纳为“三大伦理系统”,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系统、以政体为纽带的君臣系统、以教育为纽带的师承系统。这三大伦理系统涵盖十类人物群体,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含君民)、师生(含师徒)。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广泛性的十类人物群体,凡是自然人,没有人能够游离上述社会群体而独立存在。

^① 本文所用《管子》版本为(唐)房玄龄注《管子》和(明)刘绩《管子补注》,均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参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近现代方家如郭沫若、许维遹、马非百等校、释《管子》。文中引《管子》仅夹注篇名。

《管子》在上述三大伦理系统中,围绕“孝”的命题,吸收历史上各种朴素的孝文化,进行提炼,去粗取精,提升为孝论。这一理论问世,经过孔子等诸子百家进一步推进,加速了孝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家族系统是基础,君臣、师承系统是延伸。

1. 家族系统的孝论

人类的血缘关系,按照生息繁衍的脉络,可以划分三个系列,即父子、兄弟、夫妻。这三个系列涵盖了一个家族“纵向”、“横向”、“外延”的主要方面。《管子》孝论以这三个脉络为主干,论述其伦理方面的道德文化,阐明其应该遵守的孝道。

父子,属于血缘关系的纵向脉络,上溯远祖,下延远孙,以“父子”关系为环节,形成漫长的生物链。就社会而言,每一个家族都有这样的“父子”链,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管子》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关系,提出了“父慈子孝”的概念(《五辅》、《版法解》)。其中,“子”包含“男”和“女”。这是古汉语学科的研究结论。披阅先秦历史文献,“父慈子孝”的概念首出《管子》。

兄弟,属于血缘关系的横向脉络,即平辈血缘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脉络。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下,有同父同母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之别,有同祖父同祖母兄弟和同祖父异祖母兄弟之别。以此类推,上溯远祖,下延每一代,其横向延伸,包含庶出“兄弟”,形成庞大的脉络,在社会上同样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管子》针对“兄弟”关系,提出了“孝悌”(《五辅》)和“兄爱弟敬”(《版法解》)的概念,把孝文化引入平辈血缘群体之间,纳入“孝论”。《管子》中的“孝悌”,也称“孝弟”。《释名》曰“悌,弟也”特指兄弟之间“兄爱弟敬”的内涵。“孝”和“悌”并提,首出《管子》,它首次把“孝悌”视为“孝”的文化概念,成为中国“孝悌”文化之揭橥。《管子》中论及“孝悌”有6处,论及“孝弟”有7处^①,含义相同,属于文化和实践两个语言

环境下的表述。前者提升了文化内涵,后者保留了实际生活的痕迹。

夫妻,属于家族系统中的特殊系列,本来没有血缘联系的异姓家族,由于婚姻而繁衍后代,其血缘关系在“子女”中绵延,构建了新的血缘脉络。这是比较特殊的以子女为纽带的相向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婚姻发展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婚姻制度下,正常的成年男女都会有结婚的经历,夫妻关系具有普遍性。以“夫妻”为桥梁,把血缘关系扩大到“异姓”家族之间,更加广泛促进社会各个姓氏之间的联结和交融。《管子》提出了“夫妻”的伦理,曰“为人夫者,敦悃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概言之,夫“固”妻“贞”,即丈夫要坚定、本分,妻子要忠诚、专一。言简意赅,规范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赋予“孝”的命题,纳入孝论。

孝论扩大到夫妻关系,是孝论范畴的一个重大突破,衍生了家族中新的伦理关系,即媳妇和公婆(亦称舅姑),或称翁媳、婆媳关系。《管子》文献中多处论述了“翁媳”和“婆媳”二者的互动关系,借以深化这一命题,曰“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形势解》)。《管子》非泛泛而谈,针对媳妇与翁婆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指出“父母慈而不解(笔者按,‘解’训为‘懈’)则子妇顺”,“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形势解》)。“父母慈”与“子妇孝”、“子妇顺”这是《管子》提出的翁婆与子妇的伦理新义,增添了孝文化新成分。

2. 君臣系统的孝论

君臣关系,是社会公共管理机构诞生与高度发展的产物,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亦即“治人”和“治于人”两大群体。《管子》选择具有概括意义的“君臣”关系,纳入孝论,提出“君德臣忠”的概念,借以调节二者的关系。

《管子》文献中不是孤立提出“君德臣忠”这一概念,而是纳入孝论的体系,纳入父子兄弟伦理中融为一体并论,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版法解》)这一整体中,君臣关系很自然地纳入孝论的范畴。

^① 6处“孝悌”分见卷1《牧民·国颂》、卷3《五辅》、卷7《大匡》、卷19《地员》。7处“孝弟”分见卷1《牧民·首宪》、卷10《戒》、卷11《君臣下》、卷17《七臣七主》、卷20《形势解》。

《五辅》篇中进一步总结了孝论的八条要义,不仅包含君臣关系,而且列为八义之首,曰:

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悫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

关于“君德”的表述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即易“德”为“中正”。先秦文献中,“德”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中正”表述“君德”的具体内涵,实质是一致的。春秋初期,社会处于转型的历史阶段,周王朝以及诸侯国处于“礼崩乐坏”的礼乐式微时期,面临着君臣关系需要调节的严峻问题。《管子》适应这一需求,提出“君德臣忠”,改善君臣关系,是寻求社会改革的理论援助。这一新鲜的理论寓于孝论之中,通过孝文化实践推向社会实践,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

3. 师承系统的孝论

《管子》中的《弟子职》篇,是很特殊的“孝悌”理论篇,提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伦理关系,即“师徒”、“师生”之间的伦理道德。

汉代刘向刘歆在《七略》中把《弟子职》从《管子》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归入《六艺略》“孝经”类。班固撰写《汉书》,又收入《艺文志》。唐代文献学家颜师古治《汉书》,为《弟子职》篇加注,引用文献学家应劭注曰《弟子职》“管仲所作,在《管子》书”^①。确认了《弟子职》篇是管仲的著作,因而确认了《弟子职》篇的学术分类性质,即属于“孝经”类。

宋代朱熹治经,编撰了《仪礼经传通解》,把《弟子职》收入其中^②,并且撰写序言曰“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③

所谓“受业事师之法”,即是规范先生与童子之间的孝道,提出“先生施教,弟子是则”的师生关系。《管子·弟子职》经过朱熹整理,撰《序》,被“经学化”了,进一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教育领域“尊师爱

生”的孝道,原来渊源于《管子·弟子职》,而朱熹是传承这一孝道的推手。

依据朱熹章句,《弟子职》划分为九章,分别是“学则”、“蚤作”、“受业对客”、“饌饌”、“乃食”、“洒扫”、“执烛”、“请衽”、“退习”。其含义是弟子应该“早作”、谦虚“受业”、礼貌“对客”、尊敬老师、勤于“洒扫”、为老师“执烛”、“饌饌”、“敬奉枕席”等。这些行为规范非常直观地提出了尊敬老师的师生关系。从汉代到宋代,从刘向刘歆到朱熹,直至明清时期,都把这篇《弟子职》视为教育领域的“孝经”。提出弟子不仅应该尊敬老师,还应该“闻义则服”、“温柔孝悌”,在接受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要履行“孝悌”之义。

《弟子职》篇选择“师生”群体,不局限于文化教育领域,而是包含各行各业传授知识技能的师徒关系。《乘马》篇中论述了“士农工商”各业的艺术技巧传授问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专门的学问,“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其中,“诚贾”、“诚工”、“诚农”、“信士”都是具有一定专长和精湛技艺的人。“贾知贾之贵贱”,“工治容貌功能”,他们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之师。反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管子施政,士农工商“四民”不杂处,而是各有专门的居住区,便于师徒之间传承知识和技艺。《小匡》篇曰“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且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在良好的师承关系中,“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师生、师徒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构建这一群体的伦理关系,确立相互之间的孝悌之义,不仅拓展了孝论的外延,而且扩大了孝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有利于学术文化和知识艺能在良好的精神环境中传承。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颜师古注。

② 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册《仪礼经传通解》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7~411页。

③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目录》。

二、《管子》孝论的特色和价值

《管子》孝论内涵丰富,总结其理论特色和价值可以进一步认识其历史地位。

1. 孝论的理论特色

《管子》孝论的特色很多,体现典型意义的有三方面。

其一,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系统。《管子》孝论的三大系统各具专门范畴,又密切关联。各个系统以人为本,都有相对应的社会人物群体,针对性很强。各个系统之间密切联系、互相支撑,兼具整体性和个别性。在“家族”和“君臣”系统之间,各自鲜明的定义和互相关联的特色十分突出。孝论的“君臣”系统提出“君德臣忠”,但是,《度地》篇深化论述,曰“不孝则不臣矣。”这是《管子》孝论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论断。何谓“不臣”?即是“不服从”,这里指君臣关系出现了危机。春秋时期,普遍存在“不臣”的历史现象(《形势》)，“不孝则不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度透视,透视的结论,认为“不臣”缘于“不孝”。由此,引入“孝悌”来调节君臣关系,形成了君臣系统的孝论。“孝”是家族系统的是非原则,“不臣”是“忠”的命题演绎,是君臣之间的是非原则。“不孝”和“不忠”,表面看是两个系统,但是《管子》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割裂,体现了忠孝合一和相互贯通、互相制约的内在联系。各个系统内部,各种人物群体的对应关系,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

其二,精辟的理论术语。《管子》孝论提炼了各类群体人物之间“孝”的对应“关键词”,十分准确。“孝”“悌”“慈”“惠”“恭敬忠信”“子妇顺”“敦”“敬”“忠”“信”“爱亲”“善养”“思敬”“奉教”“主惠”“父母慈”“臣下忠”“子妇孝”等,各有特点,喻义明确,凝聚了对应关系的核心价值。精辟的术语传导了孝论的精髓。孝论诞生以后,有关“孝”、“孝悌”、“忠孝”这些命题,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其精辟的理论术语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上自君臣、下至庶民对于“孝悌”认识的上升,孝论的普及与广

泛传播,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精辟的术语。

其三,强调对应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形势》篇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形势解》篇进一步阐述,曰“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小匡》篇中又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论述了对应双方的互动关系,强调了双方的职责和义务。《形势解》篇又曰“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指明其利害来源于对应群体双方。

2. 孝论的理论价值

《管子》孝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很多建设性的贡献。

第一大贡献,创造了“治家”的文化理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治国”的视野,创建并且阐述“治家”的思想理论。近现代“细胞学”诞生,有人把“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这一术语揭示了“治家”与“治国”的密切关系。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管子》就诞生了这个意识,创建孝论,对改善政治、推动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稍后,孔子发挥了孝论,提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①深入浅出,把“家”“国”两个元素融于孝文化的血脉中。

第二大贡献,引领孝文化活动循着理性的自觉的路线发展。在学术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学术研究是引导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管子》孝论阐述了孝悌的历史传承、社会成因、意义与价值等等,提升了人们对于“孝悌”命题的整体认识。此后,社会上关于“孝悌”的认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尤其是自成体系的三大系统,囊括了社会十大群体人物,规范了各种人物群体的相互关系,提纲挈领,推向社会,施之于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孝悌”本来是一个

^① 《孝经注疏》卷1《开宗明义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老的文化现象,前文已述,远古的舜帝就是著名的孝子。阅三千年,至春秋初期,管子敏于时事,立足于“礼乐”式微的严峻现实,本着“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牧民》)的历史观,继承历史,创新思想文化,创建孝论,开启了中国孝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并引发了诸子百家关注孝论,各个不同学派的争鸣,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发表眇论,不断丰富中国孝文化内容,推进孝论的发展。可见,《管子》的孝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秦汉以后,孝文化和中国政治密切结合,《管子》以及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理论创新,功莫大焉!

第三大贡献,阐明了“孝悌”的核心价值。《管子》孝论提出“孝悌”是“人之高行”,视为人类社会的高尚品行。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品种中,主张人人都要树立孝的品行(以下简称“孝行”)。《管子》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这一意义。

首先,确立“孝行”德配“天地”的崇高地位。《管子》曰“道德忠信孝弟者”,“必参之于天地”(《形势解》)。管子所处的周王朝,信奉“天命”,“天地”是当时的最高原则。《管子》阐明“孝悌”所包含的“道德忠信孝弟”等道德属性,应“参”于天地,应配伍天地,应该像天地一样受到崇尚。这在思想上赋予“孝行”极高的地位。《管子》提出“天覆万物”、“地生养万物”,那么,人类社会各种人物群体应该各司其职,遵守一定的原则,“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形势解》)。清代雍正皇帝研究《管子》孝论,提炼了一句精辟的名言,曰“天地君亲师!”^①认为“天地”之下,“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而“君亲师”三字正是《管子》孝论中三大系统之主体,是精髓。

其次,确立“孝行”高于其他道德属性的价值观。《管子》从贴近自然、崇尚自然的观念,引入自然山水来譬喻“孝行”,曰“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

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深入具体论述“孝行”的理论地位,为进一步论述做出铺垫,曰“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形势解》)提出“孝行”是最重要的品行,是一种“高行”。具备了孝行的人,有一点“小过”也可以原谅。反之,丢弃了“孝”字,则是“大失”。《管子》认为“‘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形势解》)经过正反两个方面论述,确立了“孝行”作为考量大节的标准。后人精炼了这一标准,概言之曰“百善孝为先”,“忠孝立,百善从之”^②。

三、孝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管子》孝论作为当时的新鲜理论,其诞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时代的条件和深厚的思想渊源。传统的“仁政”、“宗法制”、“伦理”以及《管子》中的“四维论”等重要思想理论,为孝论铺垫了理论前提和厚实的思想基础。孝论在上述理论的支撑下,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应时而生,成为上述理论群的组合,其思想内容互为补充。

1. “孝”与“仁”的辩证关系

“仁政”是殷周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受到崇尚的政治思想。《管子》中关于“仁政”的理论也有系统总结,而且有很多新的发挥。例如,《管子》主张“仁政”与“法治”结合,认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批评“朋党”之间“蔽恶为仁”的“仁政”(《法禁》)。主张把仁政植入社会,曰“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法禁》)提出教化民众,使其懂得“仁”与非仁之“耻”,期望仁爱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仁爱之风。针对社会实际,提出了种种“仁”的观念,曰“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小问》)又曰“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势》)又曰“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小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看出,《管子》论述的“仁”,内容十分丰富。

①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明)邹元标《愿学集·张阳和(张元汴)先生文选序》。

如何在全社会树立“仁”的观念?如何把仁政思想普及到社会?《管子》孝论为“仁政”开通了理论渠道。《管子》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孝”和“仁政”的关系。

首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孝弟者,仁之祖也。”(《戒》)唐代房玄龄释曰“仁从孝弟生,故为仁祖。”房玄龄的解释割切、客观,其含义为“孝悌”是产生“仁政”的社会基础。这一独特的论断,疏通了孝和“仁政”两大理论系统的紧密联系,孝提供了实施仁政的社会基础,而实施“仁政”必然呼唤“孝”,并为它在社会实践中开花结果提供政治条件。

其次,提出了“孝悌”与“仁政”并重的辩证关系,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山权数》)所谓“高”,凸出其地位,强调其重要性。指出这二者关系到“治”与“乱”的大局,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具体到一家一户,“孝”与“仁”不可须臾割裂,曰“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形势解》)揭示了“孝”与“仁”互为支撑不可偏废的依存关系。

“孝”和“仁政”的结合,是《管子》“仁政”理论的重大发挥,也是《管子》孝论的理论来源,《管子》孝论在仁政思想支撑下更加显示了理论的生命力。

管仲之后,孔子继承了《管子》关于仁孝并论的思想,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论语·学而》)。

2. 孝论与四维论的密切联系

“礼义廉耻”是《管子》四维论的主题,亦是《管子》学说的核心内容。《管子》在孝论中一方面援引四维理论论述“孝悌”,充实孝论内涵;一方面移“孝悌”入“四维”,丰富了四维论的思想内容,成为四维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管子》首先论述了“孝悌”与“四维”的关系,曰“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按照孝悌的原理,“恭祖旧”、“敬宗庙”是孝顺父母的逻辑发展,“孝悌”

要从恭奉祖先、敬重宗庙开始。《管子》严肃指出,“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房玄龄注:校,效仿)”,百姓也不会孝顺父母,这样不利于治理国家,发展下去,将会导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严峻后果。

礼维论是四维论的首论。《管子》阐述了国家实行“礼制”和“礼治”的重要性,实施民众“知礼”的教育。《管子》提出“礼”有“八经”,即八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期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包含国君)”,履行孝论“八义”,即为人君“中正而无私”,为人臣“忠信而不党”,为人父“慈惠以教”,为人子“孝悌以肃”,为人兄“宽裕以诲”,为人弟“比顺以敬”,为人夫“敦悫以固”,为人妻“劝勉以贞”(《五辅》)。不难看出,“孝”的“八义”是“礼”的主要内容。《管子》论述的“礼之八经”中,清晰地看到“孝”与“礼”全面接轨。《管子》用“礼”强化了孝论的地位,又用“孝论”充实了“礼”的思想内容,二者融为一体。

在义维论中,《管子》论述了很多“义”的内涵,其《心术》篇点出“义”的穴位说“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唐代房玄龄在此加注曰“人事各有宜也。”也就是说,“义”的核心价值在于调节“君臣父子”的人事关系。而君臣父子的人事关系,乃孝论所云“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五辅》)。可知义维论和孝论之间的契合与互补。

在廉维论和耻维论中,《管子》倡导“教民以仁”,教民以“孝悌”,并且“错之以耻”(《法禁》)形成以“仁”与“孝悌”为荣的“荣辱”观。又曰“罢女无家。”(《小匡》)“罢”,指“乏于德义”^①;所谓“罢女”,是缺少“德义”的女人,“众耻娶之,故无家”^②。这是从精神层面规范男女道德的廉耻观。

四维论是《管子》的重要思想,四维论的推行直接为孝论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路径。

① 《管子·小匡》房玄龄注:罢,谓乏于德义者。《周礼》所谓“罢人不义之”,众耻以为伍也。

② 《管子·小匡》房玄龄注“罢女,犹罢士。众耻娶之,故无家。”

3. 孝论与宗法理论的依存关系

《管子》的孝论是从伦理的视角切入。所谓伦理,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中的辈分与秩序,这是中国悠久的血缘文化的结晶。它是告别“自然人”的分水岭。《尚书·舜典》中有“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即提倡尊崇神鬼。这里,“神鬼”指死去的祖先。从祖先到活着的生人,要按照辈分排列秩序,认同并且尊重这一秩序,就是“和”。自尧舜以来,人类社会伦理文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奴隶制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矗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家族诞生,形成了宗法制度。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何从理论上维护这一制度,调节家族成员的人际关系,《管子》孝论问世之前,尚未见实施“神人以和”的成熟理论和措施。《管子》孝论完成了这一理论建树。《管子》孝论继承中国传统的伦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孝悌”的理论,维护“宗法”思想,加固了“宗法”制度。

这不仅利用了“孝”的学说演绎伦理学说,源远流长的宗法制思想理论是催生孝论的温床,甚至可以视为孝论的母体。正是由于宗法制和宗法思想客观存在,孝论才呱呱坠地。

综上所述,《管子》孝论的形成和诞生,不仅是长期社会实践孕育的成果,也是多元思想文化理论哺育的结晶。理论家的个人因素固然重要,社会历史条件不可忽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发展,依据所在区域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特点,改造自然、创造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管子》孝论正是中国孝文化长期社会实践,到了需要理论指导的阶段而诞生于“齐桓首霸”的“时空”中。

任何一种理论都来自实践,并应用于指导实践。从这一层面思考,并不要求理论的完美。毋庸讳言,《管子》孝论有很多局限。可贵的是,《管子》孝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孝文化实践中不断延续、丰富和发展,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Guan Zi a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Culture

ZHOU Huai - yu

Abstract: *Guan Zi* abounds i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filial piety.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of filial piety; however, only in *Guan Zi* did this concept mature into a theory, which has three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ystems with plentiful theoretical terminologies. There are also key components such as blood ties, succession of masters to their disciples, obedience of officials to their emperors, etc. The filial piety theory, embodied in *Guan Zi*, originates from key historical thoughts such as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four moral principles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is theory proves to be the impetus for lat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actice whereby it is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 *Guan Zi*;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benevolence; blood ti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ethics

ZHOU Huai - yu,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责任编辑:张朝胜